

供批判用

检查交代我和上海黄涛串联的犯罪情况

一、(杨春甫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检查交代材料) 思去看望

他。因为当时宣传上海各方面工作都搞得很好，“四人帮”的死党、辽宁的大上盘毛远新还提出要辽宁学上海，想去看他学点经验。毛远新对辽宁这几年总要求每年工业总产值递增百分之十，今年他又要求最低增长百分之八，但去年未达到。我问黄涛上海每年递增多少，他说这几年就涨了百分之十，他们作计划就是百分之三左右的幅度。就在这个时候，他到上海看黄涛，并说批条条专政是批邓小平搞条条专政，那重点是在看今后在经济战线搞了几件大事，关键是国务院务虚会和今年年初的讨论会。我说务虚会不好批，计划会是有问题。他说，在邓小平领导下搞务虚会能作出什么贡献？还能作出毛主席命定的路线吗？务虚会是有搞翻案队的又怎么样，计划会也很重要，什么都弄成三秋霜不为纲，后来又搞个“三、四、四”二十条，他还挑拨对谷牧副总理不满，说谷牧副总理讲话对小平会那么一句话，人们就敢意见，当时，对他恶劣的作风、反动的观点，我当然有家训交了平远新不信任回来所讲的话的毒害，一怕翻身，二怕平远新。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检查交代我和上海黄涛串联的犯罪情况

在今年七月参加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期间，我和上海参加会议的黄涛有来往，现在认识到黄涛是“四人帮”的重要成员，和他串联，在会上发难，向党中央、国务院疯狂进攻，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一、刚刚到会时，大约在七月十米左右，我上黄涛那里去看望他。因为当时宣传上海各方面工作都搞得好，“四人帮”的死党、辽宁的太上皇毛远新还提出要辽宁学上海，想去看看他学点经验。毛远新对辽宁这几年总要求每年工业总产值递增百分之十，今年他又要求最低增长百分之八，但老是达不到。我问黄涛上海每年递增多少？他说这几年就是百分之三、四，他们作计划就是百分之三点的幅度。就在这时，他问对会议有什么看法，并说批条条专政是批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邓重新上台后在经济战线搞了几件大事，关键是国务院务虚会和今年年初的计划会。我说务虚会不好批，计划会是有些问题。他说，在邓小平领导下搞务虚会能务出什么虚来？还能务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虚来？务虚会是右倾翻案风的风源。计划会也很重要，什么都是三项指示为纲，后来又搞个“三、三、四”，二十条。他还挑拨对谷牧副总理不满，说谷牧副总理讲话对二十条就那么一句话，人们就没意见？当时，对他蛊惑的这些反动观点，我因为在家时受了毛远新不断传回来的黑讲话的毒害，一拍即合，完全接受了，还认为上海看问题水平高。我在东北组就

积极宣传这些东西，使参加会的三省，特别吉林、辽宁的一些同志受了影响。也造成我七月十九日在东北组发言，疯狂攻击党中央、国务院的严重犯罪行为。

二、后来有一天，我到江苏领导同志那儿去，想托他给一个转业干部帮助安排工作，正赶上他不在，黄涛住在隔壁，我就顺便上他的房间。当时有个部的两个同志正在和黄涛谈话，黄涛把我介绍给他们后，我坐了一会就走了。过了一两天，我又到他那里去，这次他说，毛主席一九六四年社教批示，应该适用于各级，不能只适用于下面。他宣传这套观点是极恶毒的，其目的是煽动我在东北组向党中央、国务院进攻。我自己因为对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的理解是错误的，很容易又受了他的影响。

三、七月二十日下午，反党野心家、阴谋家王洪文在黄涛房间召见我省包括我在内的三人时，黄涛也在场，这实际就是王洪文知道了我七月十九日讲话疯狂攻击了党中央、国务院以后，想把黄涛和我进一步拉在一起的阴谋活动。除王洪文插话外，好象黄也插过话。当时由于没意识到他们是搞阴谋，对黄的插话也没当回事，现在已想不起他讲的是什么了。

四、在王洪文接见后的一天，黄涛跑到我的房间，他说你们东北组对务虚会、计划会提的意见很好，批条条专政，这些问题不搞清楚不行，经济战线这是关键的东西。我也问他华东组怎么样？他说不如东北组，参加的单位多，要求不一样，还是东北组批的好。我说会恐怕不能开得很长，我们话讲得不少了，现在就是想听听部委参加会议同志的发言，他说部委，关键还是国家计委。

五、在会上，国家计委遵照华国锋总理批示，组织一些基层单

位代表轮流到各部作报告。其中有辽宁的崔树仁和上钢五厂的一个女同志，讲了几次以后，上钢五厂的这个同志病了。在一次晚饭后，我在院子里散步见到了黄涛，问他这个女同志病了？他说了病的情况，说病的很重，已住进医院。我表示不能去看她，请黄涛他们上海有人去看她时代问好。

六、七月二十四日政治局听会议汇报，谷牧副总理传达政治局领导同志讲话时说，简报涉及到务虚会的，发不发由自己定。一、二天后，会务人员就把简报大样退给我了，这个同志说主要就剩上海的黄涛和我这份简报了。（我并不知道黄涛在华东组发言的事）我就在一天晚间到黄涛那里，打听他的简报还发不发？他说他的简报还要发。然后他又问我，我说发不发还没定。他说他正修改，修改了以后还是要发，讲了话就得发简报。他同时劝我也发。回来以后，我也就把简报大样做了修改。因谷牧副总理讲了简报涉及到务虚会的，发不发由自己定的情况，我意识到批务虚会是错了，就在简报上去掉了务虚会等内容，在临散会前退给了会务人员，错误地坚持发了简报，扩大了我的罪过。

七、唐山地震前的一天，天气很热，晚饭后我到院外去散步，遇上黄涛，他跟我在马路上走了一段，问我对谷牧副总理传达的政治局领导同志听取汇报的讲话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意见，正在学习，他说有两个地方值得注意，一个地方说务虚会、计划会不要在这个会上批，另一个地方又说批邓要联系实际，这不矛盾吗？这是他在继续搞阴谋。

地震发生后，一次饭后，在院内我遇见黄涛，我说外边群众搭地震棚了，出去看看怎么样，你去不去？他就和我到马路上了

看，走到军事博物馆对面，他就回来了。这次说了一些北京组织群众抗震工作行动很快的话，也说了总是不停地下雨，群众会发生疾病的话。

以上是我从记忆中凡是能回忆起来就全部检查交代和黄涛的接触和串联，过去跟他并不太熟识，只是感到上海是先进地区，我们求上海的事情很多，是从这个角度跟他开始接触的。可是一下子就给送上门去了。他跟我讲要批务虚会和计划会，我就受了他的宣传和影响，在会上实际是干了为“四人帮”攻击党中央的一名打手。

黄涛对我显然是别有用心的。但是我从批邓以来，受了毛远新歪曲的思想、理论上毒害，很容易就接受了黄涛蛊惑的一套，和他串联，当时丧失了政治警惕，更没有认识到“四人帮”这伙害人虫利用会议发动向党中央进攻的阴谋，当时只是认为在批邓、批条条专政方面会上是有不同的看法，是有斗争的，斗争的焦点是经济战线的路线斗争这样极端错误的认识，迷失了大方向，因而长时间认识提高不了，不能迅速转变立场，彻底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辜负了党和群众（众）对我的容忍，更增加了自己的罪过。现在认识到，我和黄涛这些接触和串联，是“四人帮”予（预）谋策划的，我是在毛远新在开会前传回来的黑旨意指使下，到会又遇上黄涛的蛊惑串联，在会上发难，疯狂攻击党中央、国务院务虚会、计划会，犯了无法挽救的罪过。

杨 春 甫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七日